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美国 鲍勃·伍德沃德 著

谍影憧憧

——里根时代的中央情报局

治平 若洲 译



中国民主同盟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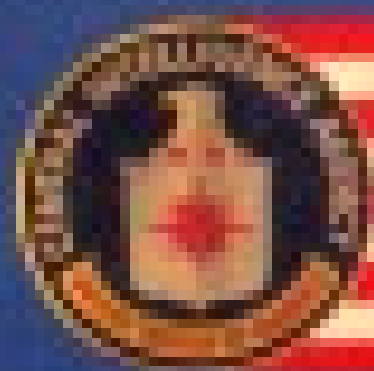


周国平 著

谍影憧憧

——民国时期的中央情报局

周国平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7771.236

731405

D22

155

谍影憧憧

——里根时代的中央情报局

美国 鲍勃·伍德沃德 著

治平 若洲 译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731405

谍影憧憧

〔美国〕鲍勃·伍德沃德 著
治平 若洲译 张治平校订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1092 $\frac{1}{32}$ · 19 · 400000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7-5057-0230-0/I · 138 定价：7.50元



鲍勃·伍德沃德,现任美国《华盛顿邮报》负责调查性报道的执行副总编辑。他素以报道白宫和国会的内幕新闻著称。早在七十年代他曾因报道水门事件而荣获普利策新闻奖。著有《都是总统的人》、《最后的日子》、《窃听者》、《弟兄》等书。《谍影憧憧——里根时代的中央情报局》是他最新的一部力作,该书被《纽约时报》评选为1988年度全美最畅销书。



图一 威廉·J·凯西在中央情报局总部。
他背后是一幅航拍的中央情报局总部全景图。
该总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



图二 1980年参加总统竞选的罗纳德·里根和他的竞选经理凯西在飞机上交谈。



图三 1985年凯西在华盛顿的一次宴会上与苏联派出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卡迪·谢夫钦科交谈。谢夫钦科于1978年叛逃美国。



图四 里根夫妇在丹尼尔·费根神父的陪同下，参加了1987年5月9日在纽约·长岛为凯西举行的葬礼。

致读者

这本书是在我对250多位情报工作人员进行采访以后写成的。我同大约100多位情报人士进行过多次谈话，而且我对其中的15位关键人物进行过六七次专访。当然，我很愿意把他们的名字和职务告诉读者。但是，这本书的政治敏感性太强。几乎所有的采访都是在“背景情况介绍”的前提下进行的，我已经答应不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假如没有这一保证，他们是不愿意同我讨论情报和安全问题的。一些人士还向我提供了文件、备忘录、活动日程表以及大事记、信件、手稿和日记等。凡是直接引语，都已注明出处。我觉得，同熟悉内情的人交谈，要比阅读成堆的文件高明得多。

关于伊朗门事件的调查，包括参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陶尔委员会、参、众两院联合调查委员会和独立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又提供了大量的新材料，特别是1985和1986两年的。一些会议和谈话的引用多半是来自会议的参加者，或者备忘录和会议记录之类。为了叙事方便起见，当谈到某人“认为”或者“相信”某一观点时，这就意味着他曾经向别人谈及某一观点。我力求尽量保持主要人物的原话，即使不是直接引语，也要充分反映他们的原意。如果记忆有误或者文件不足信，那就避免使用直接引语。

肯·奥列塔在他最近一本书中写道：“没有一个记者

能够做到百分之百地、准确地再现已经发生的事情。记忆常常把一些当事人搞糊涂，越是真相大白的时候越是如此。一个记者总是避免以讹传讹。但是，对于一个读者来说——作者也一样——有必要承认新闻报道的局限性。”我完全同意这一看法。

我从1984年秋天开始写这本书。我原来的目的只想报道在里根和凯西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最初4年。在我报道和写作这本书的同时，我仍然担任《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和记者。后来发生的尼加拉瓜、利比亚和伊朗门事件使得这本书必须包括1985、1986和1987年。既然它是关于中央情报局的第一本书，所以，我想它也决不会成为最后一本。这本书更象新闻报道而不是历史，尤其是关于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和一系列调查还在继续进行。

本书多次提到，《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和我曾经讨论过应不应该公开发表有关国家安全事务的新闻。在这方面，我确信我的记忆能力，并且力求按照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加以描绘。我同威廉·凯西的几次会晤也记录在案。我打算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讲述中央情报局的故事。

1. 中央情报局长凯西；

2. 白宫；

3. 参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

从1983到1987年，我同凯西的接触不下50次。我们在他的家里，他的办公室，他的座机上，以及招待会的一个角落进行交谈；我们也打电话。有时，他讲话非常随便，说得头头是道；有时，他也吞吞吐吐。总而言之，我从他那里获得了关于情报工作的基本看法。他曾经说过：“人

们总是说得多，做得少。”这一格言既适用于别人，也适用于他自己。他从来不愿意别人引用他的话或者成为某一消息的来源。他也知道，我正在搜集材料写一本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有几次，他还明确规定，这一材料只能用来写书，而不能登在明天的报纸上。凯西认为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不过，我确信，如果他还活着并且撰写自己的历史，这本书决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他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就象他活着的时候所做的那样。但是，我敢断定，他会承认我所描绘的一切。所以，这不是一本经过官方批准的关于中央情报局的书。凯西也只不过是一个事件的参加者。或许这是他的一种辩护方式，要么就是出于好奇。

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使用情报最多的部门。里根总统的工作人员有十几位曾经帮助过我。总统本人没有被采访。1971年，中央情报局的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曾经说过：“间谍就是间谍。你既然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情报机构，那就要设法保护它，对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70年代，情报机构滥用权力的现象被揭露以后，参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可能是对情报机构进行监督的主要工具。根据法律，它和众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代表国会行使监督权。在里根的年代，立法机关对情报机构的监督很不得力，似有若无。在这方面，参议院情报小组委员会的许多成员给了我很多帮助。

最后，还有一个保密问题。因为某人在一份文件上盖了一个“秘密”或者“绝密”的戳子，那就必须把它置于保险柜之内。另一方面，人们也有理由怀疑，这种分类究竟有无意义，它的目的似乎在于掩盖某种错误的政策，根

据常识推断，我在选择哪些材料可以公诸于世的时候，奉行的是一条中间的路线。如果希望这本书纯之又纯，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它恰恰不是这样一本书。

鲍勃·伍德沃德

引子

闹钟吵醒了正在熟睡的中央情报局长、海军上将斯坦菲尔德·特纳。平时，他不想起得太早，所以才把闹钟定在早晨7点——1980年11月20日，星期四，这是伊朗人质危机的第383天；被困在德黑兰的52名美国人质这个月初已经把吉米·卡特从总统的宝座上拉下了马。当天下午，特纳必须向新当选的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提出一份情报简报。

年初，联邦调查局发觉某些伊朗人正在华盛顿郊区使用灵敏度很高的来福枪练习打靶，所以临时决定在特纳的住宅周围增设24小时的安全岗哨。岗哨现已撤出，住宅也显得安静多了。

特纳今年56岁。作为一名退役的四星海军上将，他的生命正处于巅峰期。作为一位系统分析学家、海军思想家和罗得岛的学者，他每天总是面对那些生命攸关的大问题。他是一位易动感情的人。如今，他夹在新、老两位总统之间，不时被交接班过程中出现的互相矛盾的感情推来推去。

首先，他必须权衡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向里根移交核心机密。新总统应该懂得那些带有爆炸性的和充满风险的秘密作业，以及从事间谍活动的种种技巧。这些至关重要

的材料他还从来没有向新闻界披露过，更没有让苏联特务截获。这种移交只能在他和里根之间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直到里根任命一位他所信赖的人为止。在先前的两次吹风会上，由于里根的一些政治追随者形影不离，使他无法向里根透露任何机密，不知今天的情况怎样。特纳想要告诉这位新当选的总统，有一项最机密的情报作业将使100多位情报人员的生命处于危急之中。特纳还需提醒里根注意广泛的哲学问题——从事间谍和秘密行动的机遇与风险。有些是需要总统作出抉择的，还有一些是他曾经许诺要重新注入活力的地方。

特纳也想要增进他自己对新总统的了解。在先前两次吹风会上，里根的思想有些溜号，几乎没有进入角色。当里根向他挥手的一刹那，特纳也不无轻松和惬意之感；他对世界上的诸多问题总是一笑置之，这是一种地道的好莱坞手法，一句保守派的潜台词。这同卡特总统的严肃的、近乎无情的盘问相比，真是天渊之别。特纳同里根接触得越多，他对这位当选总统的思辨能力的怀疑便越大。有一次，他甚至在背后说此人“愚蠢透顶”。

特纳也不得不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他想表明，他渴望留任中央情报局长。里根和共和党人曾经指责卡特政府扼杀中央情报局，使其无法开展有效的间谍活动。共和党人甚至说，特纳作为一局之长过多地卷入了卡特的人权运动，并且迷恋于卫星和电子窃听技术；后者虽然干净、相对安全，但是没有任何进取精神。因而他们给中央情报局贴上了一个“脆弱”的标签。特纳相信，如果当选总统给他一次机会，他会据理力争。他的中央情报局所干的一些事情

会使罗纳德·里根大吃一惊。

特纳曾经对他的助手说：“里根不想使中央情报局过于政治化，他所关心的是我们是否走在正路上。”特纳的助手们觉得，他们的局长过分乐观，他在中央情报局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的老朋友、中央情报局的公共事务官、一位退役的海军上校赫伯认为，特纳需要某种心理治疗。他对特纳说：“请放心，他们决不会让你留下来。早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就说要把你搞掉。”特纳仍不放弃他的乐观主义。不过，有时也难。就在这次总统选举之前，他把他的15名高级幕僚召集到弗吉尼亚州的乡村、中央情报局的一个秘密训练营地开会。他半真半假地开了一个玩笑，让大家对这次总统选举的结果进行一次“公民投票”。投票结果是卡特2票，里根13票。这不啻为泼在他脸上的一盆冷水。

选举后的那天早晨尤其可恶。中央情报局总部的走廊里充满了笑声。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很少探头探脑出来欢呼，他们确实把里根的胜利当作巴黎的解放日。

特纳起床以后洗了一个澡，梳妆完毕便坐下来看报。他随手拿起一本《基督教科学》周刊。上面的《每周一课》说：“告诉你的病人，他必须保持头脑清醒，赶快把他目前的注意力从虚幻的证据上面移开……”特纳觉得，这似乎是一个不祥的兆头。他以前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对宗教的力量深信不疑。早在20年代，当他父亲在一次股票交易中破产自杀后，他和他的母亲顽强地活了下来。后来，当特纳的兄弟死于车祸，他自己就乞灵于宗教寻求安慰和解脱。然后，他用一根红笔在那份《基督教科学》周刊上打

了一个着重号：“苦难常常是上帝关怀的证明。”

已经没有什么时间了。他不顾上帝的警告，站起身来；这位结实的、身高5英尺9.5英寸的彪形大汉带着小跑下楼吃早点。他的厚厚的银发在他自己制造的旋风中微微扬起；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总是泛着轻松的微笑，还有他那扶轮社的仪表，可以使你回想起任何人、任何事，但绝对不是中央情报局。在早餐桌上，他只喝热水、柠檬和桔子汁。《基督教科学》告诉他，戒酒、戒烟、戒咖啡，特纳甚至连带咖啡味儿的冰激凌也不要吃。

突然，《华盛顿邮报》的大字标题映入眼帘：“据报道，凯西即将就任中央情报局长。”特纳立即抓住了这张报纸。怪哉，他从来没有听人谈起过这件事。威廉·凯西，就是那位67岁的里根竞选经理。特纳认为，选中此人是一大退步，完全没有道理。里查德·尼克松曾经任命他的竞选经理约翰·米齐尔担任司法部长。难道中央情报局会是今年这场政治争夺战的战利品？

特纳继续往下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凯西曾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工作过。”特纳认为，这就好比找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海军上将来领导一支舰队一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战略服务局的一批老人至今还留在中央情报局，他们给特纳制造了不少的麻烦。这批老人是情报业务的实际操作者，他们组成一个小圈子。不过，一旦同白宫和国会进行摊牌，他们就要遭殃，就象70年代中期国会对中央情报局滥用权力所做的调查那样。这些老手之所以幸存，是因为他们不可缺少。每一届总统、每一位中央情报局长都需要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

专门从事肮脏勾当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他们组成了一个俱乐部，但是从来不开会。他们是从事秘密活动的中坚分子，甚至连对他们的奖赏也是秘密的。他们既是中央情报局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一颗毒瘤。《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阶段，凯西曾负责向德国后方空投特务。那是35年以前的事了。

特纳曾经期望，即使出于礼貌，他们也应该在向新闻界透露之前正式通知他，他将被人取代。也许这则消息是一个探测气球，或者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一直到这次总统竞选，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凯西这个名字。两个星期以前，里根在他当选总统以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凯西将重操旧业，回到他在纽约的私人律师事务所去。

被免职的前景使特纳更加确信，是他帮助中央情报局走出了阴影，摆脱了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之后的动荡岁月。那时，国会的调查把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档案翻了一个个儿：密谋暗杀外国领导人，未经授权使用充满危险的迷幻药，储存被总统明令禁止的毒液和毒品，对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人进行邮检、窃听和跟踪等。是他引导中央情报局闯出了那个窘困的时代。在他看来，那是一种偏执的、鬼迷心窍的秘密文化，并且终于表现出，经过改造的中央情报局还是能够严格按照国会情报小组委员会的规定，从事有效的乃至敏感的情报活动。特纳认为，在他的领导下，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作业是稳健的，因而赢得了国会的支持。如果大家都能认识到这一点，它也理应赢得里根总统和美国人民的支持。

在选举前的一个月，特纳在家休假一周，关起门来起